

抗日战争史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概述

吕 梁 王树荫

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的抗日战争史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于1989年10月17日至20日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有：

一、关于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是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与会者着重讨论了以下问题：

1.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原因及其历史背景。针对日本服部卓四郎等人坚持卢沟桥事件完全是一次突然发生的事件，当时日本方面并不想使事态扩大的观点，与会同志运用大量历史资料，论证卢沟桥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有计划、有准备制造的事端。日军之所以选择卢沟桥作为突破点，是由卢沟桥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日本华北驻屯军自1931年以后，便无限制地强化，发展成为一支数量庞大、装备精良，足以威胁华北的部队。政治上，它以武力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经济上肆意掠夺；军事上恣意挑衅，直至发动卢沟桥事变。这一切都是在日本政府的支持怂恿下进行的。至于“七七”事变后日本所谓的“不扩大”方针，不过是施放的烟雾弹；其“和谈”的姿态，只是缓兵之计，其目的在于加紧调兵遣将，部署平津间的全面大战。因此，卢沟桥事变绝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标志，这一历史事实，不容篡改。

2.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要加强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澄清西方史学家“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卢沟桥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端的观点被大多数同志接受。会上有的同志就中国抗日战争对苏联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和英美取得太平洋战争胜利所起的作用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对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帮助，与会同志给予充分肯定。苏联学者所作的题为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的报告，受到一致肯定和欢迎。也有同志详细考察了美国进步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埃德加·斯诺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友人对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

会上，对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再度展开讨论。有的同志对前几年有些学者提出的抗日战的教师离开教材，宣扬一些不正确观点，或者不加分析地以赞赏的态度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因此，大家建议，一定要严格教学纪律，教研室要严格把关，对一些重大问题和理论观点，要坚持集体讨论，共同确定，不能个人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这次座谈会，提高了大家对编写统一的文科教材的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相信在中央和国家教委的领导下，通力合作，一定能编写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文科教材。

争应以九一八事变、或以一二九运动及“八·一三”淞沪抗战为起点等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首先应区别“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等几个概念，前者起点为九一八事变，后两者起点是卢沟桥事变。理由是：其一，九一八事变至七七抗战期间中国部分抗日战事，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但属于局部抗战，是全国性抗战的准备和前奏。其二，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看，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非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体在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于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完成；其三，七七抗战之所以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发生，成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乃是因为从这时起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民族奋起抗战，国民党政府也下定了抗战决心，并具体组织抗日战争。

此外，会议还就卢沟桥抗敌中的主要人物的评价展开了讨论。对近年来秦郁彦等日本学者利用金振中回忆录作文章，扬言是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开的第一枪，作了有说服力的反驳。有的同志还对卢沟桥事变中的几个主要战场，作了很有价值的考据，纠正了以往有关论著中一些地名的讹误。例如，卢沟桥事变中中日双方军队争夺最激烈、伤亡最多的交战地区，很多论著中都写作“龙王庙”，事实上应为“回龙庙”。

二、关于中国国民党与抗日战争

自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以来，有关国民党抗战方面的文章、专著相继面世，本届研讨会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七七”抗战爆发前的国民党对日战略和基本政策。有的同志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处理对日关系及内外政策的基点是如何摆脱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维持以至加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其基本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在这样的基点和原则下，蒋介石确定的对日政策的中心是“和合”原则，即对日言和，中日合作。根据这一外交准则，蒋介石为解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四不外交方针，和“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即以军事上的有限抵抗，求得“四不”外交方针的贯彻，达到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目的。这便是蒋介石所标榜的“革命战略”，也是我们考察国民党政策和行动的钥匙。西安事变的爆发，标志着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破产。

2.关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的抗战态度和抗日战略。有的同志认为：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经历了“和与战”的抉择过程，曾对和谈抱有很大的幻想，特别是宋哲元的态度更是游移。后在日军不断扩大事态面前，才逐渐丢掉幻想，决心抗战，并在政治上发起强大的宣传攻势，在军事上加紧部署，同时辅之以外交手段。这些对策为全面抗战的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有的同志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就下了抗战决心，并在具体组织领导抗日战争。蒋介石的“七·一七”庐山讲话，是义正词严的抗战声明，是表面上不放弃和平解决希望，实际上号召全国投入抗战的动员令。毛泽东曾将这篇讲话列为“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文件。此外，在具体行动上，国民党政府不仅就坚持抗战对冀察当局下了许多指示，并调集军队、武器弹药、粮秣、燃料和医疗器材援助廿九军；而且在全国进行军事动员，调集部队，规划作战部署，研究绝交宣战的利弊、政府机关迁地办公等等。这些都说明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已有了抗战的决心。

3.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战场。讨论的重点是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一种意见认

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开辟了同正面战场并存的游击战场，如山西游击区、豫鄂皖边区游击区、浙西游击区及海南游击区等等，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对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支持长期抗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者进而指出：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采取，游击战场的形成，是国民党自己的决策，是持久消耗战的产物。从蒋介石到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抗战军事思想中，就包涵有游击战的思想。因此，我们研究国民党抗战时，对其游击战场，不能视而不见，或采取否定的态度。另一种意见针锋相对，认为确有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敌后从事游击战，但并未形成一个敌后国民党游击战场；此外要对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进行具体分析，不但要弄清国民党在进入相持阶段后重视游击战的用意，而且还得考察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究竟干了什么？历史的事实是：国民党在1938年底以后重视游击战，派军队进入敌后，目的是为了同共产党争夺敌后，限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发生在敌后的反共磨擦，正是这些国民党军队挑起的；最后，国民党从事的游击战并未都坚持到抗战胜利，敌后国民党军队中相当部分后来投降日本，成了伪军。只有与共产党合作的那部分国民党军队，才在敌后游击战争中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三、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问题

回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总结合作的经验，展望海峡两岸同胞重新携手、共建祖国美好未来，仍是本届研讨会的重要话题。

1.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原因，较为一致的观点是：1935年的华北事变，进一步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国共两党逐步调整了各自的政策，相互作出妥协，打破了长期对立的局面，重新接触，这是国共双方能再次合作的前提。过去那种认为仅仅是共产党一方主动，国民党纯粹被动的观点已不多见。

2.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的时间和标志：会上有的同志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只为国共再次合作的谈判打下了基础，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并不能以此作为国共再次合作实现的起点。理由是两党虽已停战，并不等于合作的实现。国共双方能否再次携手，取决于红军改编、边区改制、以及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等问题谈判是否成功。只有上述三个基本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才标志国共合作的形成。

四、关于其他研究课题

会上，有的同志专门介绍、比较了海峡两岸有关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状况，主要涉及抗日战争史的分期问题、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各自侧重面、主要研究成果之异同等方面的内容；也有同志广泛收集资料，认真研究，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损失作了极有价值的考证和统计，包括抗日战争的战灾涉及面，我国军民的伤亡，经济文化、国家资源、财政税收以及沦陷长达14年之久的东北的损失的具体数据。